

周恩来夫妇： 也曾有过两个孩子



年轻时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是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遂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

后来，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别人，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第一个孩子无奈被流产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颖超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有一段时间邓颖超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颖超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颖超就自作主张去街头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颖超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颖超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颖超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恩来重逢，当时的情况邓颖超这样回忆道：“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

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已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

第二个孩子刚生下便夭折了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时，快生产的时候周恩来又不在。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恩来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颖超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

邓颖超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

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颖超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3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恩来刚刚寄给邓颖超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颖超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呆下去了，邓颖超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颖超，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颖超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颖超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颖超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恩来时，人已是虚弱的不行。

后来，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击掌为信”

在古时，凡是打赌、盟誓、协议等有关“一言为定”的事，往往双方会用打手心的方式表示不再反悔和改变。

唐朝以前，人们之间作交易不付现金，只是检验货物，商定价钱，谈定数量和付款时间地点等后，双方击掌为定。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波斯和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等国的商人来中国做买卖，使这种“击掌为信”的习俗流行于民间对外贸易中。后来这种最初在商界流行的习俗，传到民间其他方面，成为一种广泛的习俗。王宝钏和其父王丞相之间因为婚姻争执《三击掌》起誓的故事，就是以戏曲的形式反映了这一习俗。明朝郑和下西洋，传说船队到达印度时，他们对中国运去的产品进行一一检验、论价，最后双方互相击掌，表示遵守协议。这种击掌成交的习俗，后来在国际也渐渐流行开来。

现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谓的拍板定案，和“击掌为信”的习俗也有着渊源关系。

汉字拼音的发明者

最早发明汉字拼音的人是法国的传教士金尼阁。金尼阁于利玛窦去世后的1610年来华。他在山西结识了精于小学教育的韩云，两人经过半年的研究，将成果整理出初稿。在涇阳，金尼阁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王征，二人在利玛窦等传教士学习汉字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的基础上，修订编制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汉字拼音字汇》一书，时为1626年，人称“利、金方案”。

周恩来1958年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讲：“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历了350多年的历史。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尽管此书尚不完善，但它准确地记录了明末的汉语读音，展示了现代辞书的雏形，成为汉字改革的先驱。”

标点符号的由来

汉代以前，人们写的文章里面没有标点符号，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费劲，还会时常造成误会。直到汉代，人们才发明了“句读”符号，把语意完整的段落称为“句”，把语意未完需要停顿的地方称为“读”（音“逗”），并把“。”作为“句”的符号，把“、”作为“读”的符号，而句号（“。”）和逗号（“、”）则发明于宋代。

“寿星”一词溯源

人们习惯上把长寿者称之为寿星。

寿星即“老人星”，亦称“南极老人”。在我国古代，有两个星宿被认为与福寿之相有关，这就是“角”、“亢”两宿。《史记·封禅书》中说：“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也。”旧俗以四星为长寿之星，于是“寿”与“星”便连在一起，形成“寿星”一词。

据史料记载，自周朝开始一直到宋朝，历代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寿星活动。到了宋元时代，“寿星”已成为高寿者的代称，这既充满对高寿者的敬意，同时也表达着人们对长寿者的祝愿。

(本栏稿件提供：李德昌)

王非曼：中国最早的公费女留学生

王非曼(1897~1977)，山东省济南市齐河县人，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全官费赴美留学生。在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教授。为中国大学设家政学系的开先河者。1937年抗战中随校内迁，先后执教于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并兼系主任。1947年赴美与其夫慈冰如团聚，后在美定居。1977年12月在美国病逝，享年80岁。

裹了脚的村姑爱读书

王非曼1897年出生于齐河县城东北的安头乡王举人庄。

位于黄河北岸的齐河县，虽与济南省城仅为一河之隔，但当年此地农民生活之贫困、文化经济之落后、乡村习俗之封闭，实非今日所能想象。

19世纪末，黄河下游几乎年年闹洪灾，本着“淹北不淹南”惯例，每逢夏秋之际出现汛情，便立即在齐河地决口放水，以确保济南的安全。洪水漫天而来，四处一片汪洋，庄稼全被淹没。人们就在土坯屋顶上或大树杈上栖身。洪水退去，留下一层厚厚的黄土细沙。年复一年，小县沙漠化严重，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散落着一些村舍人家。

王非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被洪水反复浸泡的盐碱窝里。晚年回忆苦难的童年岁月，她已经记不清当年到底有多少次和多少天是在屋顶上度过的了。

王非曼幼名王淑静。6岁的王淑静按当地风俗裹了脚，裹了脚的村姑王淑静，却对学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在这一点上，她得到了父母的全力支持。她读书识字与学缝纫女红齐头并进，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女子无才便是德，全村人侧目而视说：“王家又出了个‘半疯子’！”

1918年是王非曼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之年。这一年她21岁。山东省的

一些会议员提出了山东省公派官费赴海外留学，增加女留学生名额的议案。提案几经周折终于在省议会获得通过。王非曼听说后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回省城去读书！要到国外去读书！

不顾终身痛苦做双脚矫正手术

王淑静来到济南后，先是在南关广智院街家里自修，1919年暑假过后，去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上了6年级。她是留着大而粗的辫子，穿着旧式大襟单衣，从家中步行着迈动三寸金莲步，一鼓作气进入附小教室的。

1920年她跳跃式前进，暑假后又以“同等学力”考入济南女中三年级。当时女中位于南关毛家坟，相距广智院也不远。但因与班上同学年龄相差悬殊，读了一年，她就不去了，而是在家自修完了全部课程。当时中学还是4年学制。1922年后实行“壬戌制”才改为6年。也就是说，她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初小到高中的“三级跳”。真是一个奇迹。

这期间她还有一惊人壮举，就是寒假期间，她大胆地走进齐鲁医院外科，要求做双脚矫正手术。因她的脚骨已经定型，无法放开，要每只脚锯掉3个脚趾才成。她二话没说，上了手术床。手术获得成功，尽管这给她带来终身痛苦，但她毕竟可以穿上定做的皮鞋，像男子那样迈开大步走四方了。

1922年，大弟王弘考取了山东半公费赴美留学。1923年王淑静以全优成绩考上了山东全公费赴美留学生。当时规定女留学生名额为6人，当年仅有两名女生被录取，王淑静名列第一。出国之前，她还完成了一件大事：她将自己的名字王淑静改为了“王非曼”。

留美八年，海归最早

1923年8月，王非曼漂洋过海踏上赴美留学旅程。

她于9月初入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化学系学习。一开始，课堂上英语视听会话，无数化学术语名词弄得她紧张到了极点，彻夜失眠、不思饮食、精神恍惚。同班同学都认为她得了病，有的干脆劝她退学，但她总是一个“不”字。顽强拼搏了半年，到第二学期结束考试时，她获得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此开始，全班的最优异成绩便非她莫属了。

当年中国留学生被录取多为理工科，但化学专业并非王非曼所愿。1925年毕业，她获得学士学位，遂又考入了明尼苏达大学，学她喜爱的家政学。3年后，她成为“家政学理学士”，但仍不满意，她又报考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家政学系，1931年获得该学院的家政学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她连年获得奖学金和不少荣誉证书。

1931年春，王非曼留美8年后，满怀一腔报国赤诚回到国内。

她回到济南与父母团聚，稍作停留后，便应聘去了天津，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教授。家乡齐鲁大学闻知此事后，便在王非曼寒假回济南时，特别邀请她去讲课，并想把她聘到齐大，但天津坚决不放。她只好对天津请假一个学期，在齐大开课一学期后重返天津。

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开设家政学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是最早者之一，王非曼则为开风气之先的最早女教授之一。当年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的专任教授中，齐国梁(院长)、孙家莹、陈慧芬、孙金胜、黄玉莲、程之淑、王非曼诸人，均为第一代留学欧美的家政学、教育学专门人才。几位女教授中以王非曼留学海归最早。

王非曼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学五六年，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师范及中学家政学科教师，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开启女性智慧，提高女



性社会能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王非曼随校西迁内地坚持战时办学，经历了8年多颠沛流离的文化苦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病逝美国，享年80岁

1942年暑假期间，王非曼曾随团访问延安。参观访问了近40天，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据传，访问团师生中即有共产党。其实王非曼本人也有一个“革命情结”，原因是她当初有个恋人，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回国后闹革命牺牲了。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学校成为动乱区，被战争弄得混乱不能上课，教师学生相继离去。王非曼先是回到济南，不久即去了美国与丈夫慈冰如团聚。

慈冰如为山东省茌平县人，当年与王非曼同船赴美，在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曾先后为东北吉林大学和山东齐鲁大学教授。

1977年12月，王非曼在美国病逝，享年80岁。其夫慈冰如先生则于1972年病逝美国。王非曼夫妇生有一女，名“伍玉乐德”，医学博士，曾任全美护士学院院长，已退休，退休后仍继续工作。(摘自《齐鲁晚报》)